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 辛亥革命与 中国政治发展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本书于2010年入选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定的  
全国“庆祝建党90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百种  
重点出版物选题”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 辛亥革命与 中国政治发展

章开沅 严昌洪 主编

D083  
2011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章开沅,严昌洪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0-1

I. 辛… II. ①章…②严… III. ①辛亥革命—影响—政治—发展—中国—民国 IV. ①D693 ②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12 号

##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

---

主编:章开沅 严昌洪 ©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易雯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44

字数:675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123.0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 序 言

章开沅

辛亥革命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呈现空前的繁荣，但早在 1983 年即曾出现一种比较消极的论调，仿佛辛亥革命史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有什么更具深度的突破。为了化解这种不必要的困惑，我在 1983 年 12 月中旬郑州举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做过题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发言，提出要加强理论探讨，提高通识素养，并且特别强调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以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此文曾在《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上发表，并且引起许多同行学者的共鸣。而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也在研究取向中侧重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等方面，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进入 21 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学者研究重点逐步下移，辛亥热早已盛况不再，国内又有一些学者误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山穷水尽，很难再有什么重大突破。时隔 20 年，前后两种论调如出一辙，而我至今仍然难以苟同。因为，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短暂的偶发事件，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有其酝酿已久的“来龙”，又有其影响深远的“去脉”，真正要弄清历史真相并作鞭辟入里的解析，仍然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探索。我想，其所以有些人认为辛亥革命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恐怕还是由于把辛亥革命看成是狭义的政治事件，而且是孙中山与少数革命领袖的个人功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把辛亥革命看作短暂的政治事件，而且在研究中又更加缩小为简单的革命事件。

经过“文革”10年后的反思，我们又曾经因此而厌倦政治史的研究，转而侧重于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与现代化的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多学科的交叉运用，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忽略从政治史的角度加强辛亥革命研究毕竟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作为历史主体的辛亥革命毕竟还是一次政治大运动。

查阅手边1986年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其“政治革命”（Political revolution）一词的释文是：“对政府及其有关各种机构进行突然的、重大的、暴力的变革。革命就其最根本的含义来说，就是反对已建立的政治秩序，并最终建立起一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新秩序。”释文还把革命区分为“有限”与“无限”两种，前者纯粹是政权的更迭（包括政变），后者则是“同西方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这当然是就欧洲历史上一些“大革命”而言，但无论是哪一种革命，也不管其直接原因为何，“革命看来总是某些政治社会弊病发展的结果，而并不只是表面上那样的一种突然爆发”<sup>①</sup>。孙中山是懂得西方近代政治革命含义的，所以他在1906年秋冬之间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强调指出：“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sup>②</sup>因此，辛亥革命自当归属于“无限革命”或“大革命历史”范畴。

与此相关的则为“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一词的释文：“指用科学分析方法对政治进程进行系统的研究。”<sup>③</sup>当代的政治学早已突破了只限于研究国家、政府以及它们为行使其职能而建立的各种机构的陈旧狭小框架，认为政治系统乃是整个社会系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与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相关的一切活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系统”理论为政治学词典增加许多新

---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1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95页。

③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18页。

的术语，如输入和输出、反馈、循环、网络、信息贮存和恢复政治社会化、集团群、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等。政治学现今发展甚快，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就必须经常注意政治学进展的新信息，并注意把其中有益的成分运用于辛亥革命研究。

与欧洲某些国家的大革命相比较，辛亥革命虽然难以视为成功的范例，但是它毕竟是发生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历史悠久的中国，而辛亥革命又发生在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变化的转型时期，加以全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众多民族之间的差异甚大，这样便更为增添了辛亥革命史极其复杂而又丰富的特点。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历经 200 余年而至今未衰，甚至对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形成还颇有裨益；那么，历时尚未百年而且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辛亥革命研究，怎能视为已经走到尽头了呢？即以日本硕果仅存的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而言，其所以能够历经 30 余年而长盛不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广义的多学科交汇的“辛亥革命研究”，而没有拘执于狭义的仅仅作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与我经常提倡的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心态研究，寓意大体相通。

我很高兴地看到，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以及注意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已经为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对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研究蔚然成风，从而又推动了对于民间社团乃至地方精英等社会团体的深入探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对清末新政的研究已不再停留于笼统的褒贬，而是扎扎实实地作政府机构与职能转换等重大问题的具体研究。仅从 2001 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来看，对于清末民初从外务部到外交部的研究，对于学部的研究都已取得可喜的成绩。而作为宏观研究的姜义华《论辛亥以来现代国家与近代社会非同步发展的政治整合》、朱泫源《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一个政治结构的观点》、深町英夫《国家、社会之间的“分夺”与“崩落”》，都能从不同侧面与不同角度拓宽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的研究思路。

但是，所有这些个案的与宏观的研究，还只能说是正在起步，因为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仅以清末中央政府所设外务、

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以后海军分出）、法、农工商、邮电、理藩等 11 个部，据我所知其中已经和正在研究的不过四五个部，而几乎每个部的档案文献都浩如烟海，其研究工作量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如果不对这些部逐个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清末中央政府的结构、职能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弄得一清二楚？由此延伸说来，对于省、府、州、县等地方政府，岂不同样应该如此逐级逐个认真加以研究（当然可以个案与宏观结合），否则又怎么能够把当时地方政府的结构、职能及其实际运行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这就使我又想起顾亭林“采铜于山”的比喻。他给友人书曾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sup>①</sup>我常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只有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煎熬的苦学之士，才能在史学领域寻得若干真知。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辛亥革命已经无可研究，因为需要发掘和整理的资料还有许许多多，需要寻究与阐明的问题更是满坑满谷，归根到底还在于我们自己有无勇气与毅力投身于这项异常艰苦而又乐趣无穷的科学事业。

我们就是本着这种意愿，集体合作对辛亥革命作通盘性的政治史研究，而本书则是其中中期成果的结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成熟的学术精品，而宁可看作是一项政治史研究学步的起点。目的就是谋求各界先进的批评匡正，帮助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新的比较成熟的成果。

本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的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它是集体研究的结晶。参加本书撰稿工作的有武汉地区多名学者，他们的分工如下：

- 第一章 罗福惠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 第二章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 第三章 刘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sup>①</sup> 顾炎武：《亭林文集》第 4 卷，光绪年间刻本。

- 第四章 严昌洪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第五章 袁继成 李明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第六章 刘秋阳 武汉工程大学文法系  
第七章 范小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第八章 黄华文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第九章 高 路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目 录

序 言 .....	章开沅
<b>第一章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b> .....	(1)
一 19 世纪末以前政治思想的回顾 .....	(1)
1. 如何看待传统的政治思想 .....	(2)
2. 革新与守旧思想六十年间的消长 .....	(13)
二 20 世纪初年的一轮思想启蒙 .....	(33)
1. 弘扬民族主义和国民意识 .....	(33)
2. 脱除种种奴隶羁绊 .....	(37)
三 体制内改革思想的延续 .....	(47)
1. 君主立宪思想的演进 .....	(47)
2. 体制内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关系 .....	(53)
四 革命民主思想星火燎原 .....	(59)
1. 革命思想和民主主义的形成 .....	(59)
2. 三民主义把革命思想民主思想系统化 .....	(65)
3. 革命民主思想对“君主立宪”主张的胜利 .....	(71)
五 激进躁等与偏颇谬误的滥觞 .....	(78)
1. 社会主义的早期传播 .....	(79)
2. 无政府主义的杂音及时人对其所作的初步批判 .....	(88)
<b>第二章 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认同</b> .....	(103)
一 世界观念与“种”、“群”意识：晚清民族意识的	

初步自觉·····	(104)
1. 世界观念与“华夏中心主义”的衰微·····	(104)
2. 进化论的传入与“种”、“群”意识·····	(109)
二 史学与文学：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 ·····	(118)
1. 新史学与民族国家理论建构·····	(119)
2. “小说界革命”与民族国家想象·····	(132)
三 省与国：20世纪初国人民族国家认同的二极 ——以“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为中心·····	(139)
1. 非“省界”·····	(141)
2. “筹边建省”论·····	(145)
3. 问题的实质·····	(148)
四 名与利：清季国籍问题与国人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	(151)
1. 国籍问题的表现·····	(152)
2. 民众对荷属国籍法的反应·····	(157)
3. 国人国籍意识的成熟——国籍法·····	(160)
4. 清政府的对策·····	(164)
五 满与汉：清末民初民族国家建构道路的曲折与发展 ·····	(168)
1. “化满汉畛域”·····	(170)
2. “排满”与种族主义·····	(174)
3. “大民族主义”的出台·····	(178)
4. “五族共和”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方案·····	(181)
余论：中华民族认同的最终实现·····	(187)
<b>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民初议会政治·····</b>	<b>(189)</b>
一 近代中国人对议会制度的认识·····	(189)
1. 西方议会思想的引入·····	(189)
2. 20世纪初的议会制度设计·····	(193)
二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最初实践·····	(202)
1. 辛亥革命催生了代议制度·····	(202)
2. 南京临时参议院·····	(205)



	3. 北京临时参议院 .....	(211)
	4. 关于议会政治的讨论 .....	(219)
三	第一届国会 .....	(228)
	1. 第一届国会的组织构造 .....	(228)
	2. 国会的内部关系和运作 .....	(229)
	3. 议会制度的畸变 .....	(247)
四	辛亥革命的议会政治遗产 .....	(252)
	1. 孙中山对代议政治的反思与直接民权构想 .....	(252)
	2. 议会政治是否适合中国 .....	(261)
	3. 话语转换：新的替代方案 .....	(265)
五	民初议会政治的困境与政治发展 .....	(277)
<b>第四章</b>	<b>北京临时政府的制度建设 .....</b>	<b>(286)</b>
一	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 .....	(287)
	1. 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	(287)
	2. 中央政府机构的整合与人员安排 .....	(289)
	3. 过渡时期的制度运作 .....	(295)
二	制度建设的资源、需求与运作机制 .....	(302)
	1. 北京临时政府制度建设的现成资源 .....	(303)
	2. 北京临时政府制度建设的运作机制 .....	(306)
三	中央政治制度的建设 .....	(311)
	1. 前清制度的废除与援用 .....	(311)
	2. 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制度的承继与修订 .....	(315)
	3. 新制度的创立 .....	(319)
四	地方政治制度的划一 .....	(321)
	1. 革命时期地方制度的混乱 .....	(321)
	2. 划一地方制度的尝试 .....	(323)
五	民国初年部院之争 .....	(331)
	1. 论争之由来 .....	(332)
	2. 论争之结果 .....	(337)
	3. 论争之意义 .....	(339)
六	北京临时政府政治制度建设评价 .....	(344)